

宋士堂著

孫中山宋庆龄
社会主义思想论



红旗出版社

D672.0
+

96700

1961/10 74

孙中山 宋庆龄
社会主义思想论

宋士堂 著

红旗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宋士堂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4. 12

ISBN 7-80068-720-1

I. 孙… II. 宋… III. ①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②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IV. 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211 号

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

著 者 宋士堂

责任编辑 冷铨清 封面设计 尚 东

出 版 红旗出版社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大 32 开 13 印张 313 千字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册

ISBN 7-80068-720-1/K·41

定 价 15.00 元

前 言

一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政治家、思想理论家，是近代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儿子和领袖。宋庆龄是孙中山的亲密伴侣、战友和忠诚继承者，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政治家。这两位时代的伟人，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乃至国际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都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因此，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受到理论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对于这两位伟人的研究，愈来愈活跃，前者已取得很大成果。据专家统计，建国初期阶段（1949—1966）内，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百篇纪念和研究孙中山的文章；各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多列有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动的专章；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了著名论文《纪念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选集》、《辛亥革命》资料和回忆录的出版以及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都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又据不完全统计，建国至今，出版孙中山研究著作约有百部，论文数以千计，评述近百篇。这众多的著作论文和评述，从各方面、不同角度，总结、评述和反映了孙中山研究的成绩和进展。

应当指出，在众多孙中山研究成果及评述中，有些专家学者

在充分评估和肯定过去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看出了不足。如有的学者认为在初期阶段“对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的思想和活动的研究，包括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段重要历史的研究，尤为薄弱。有些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对于粉碎“四人帮”至今这一阶段的孙中山研究工作，认为已取得的“成绩只能说是初步的”，“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同应有的要求相比，还是相差很远”。

建国以来在孙中山研究工作中，还有宝贵的著作成果和评论意见，这就是参与孙中山最后十年革命实践与其并肩战斗、终生从事孙中山研究、忠诚继承发扬其革命理想和事业、思想理论和遗愿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所发表的著作和评论。这些珍贵的著作和评论，大都载于《宋庆龄选集》及《永远和党在一起》中，有的评论是口头传达的。使人遗憾和惋惜的是，长期以来在孙中山研究队伍中，似有对于宋庆龄关于孙中山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的倾向。就近十几年的评论来说很可以说明和佐证。对于宋庆龄研究孙中山的成果特别是观点，在学术界孙中山研究的评论和著述中提及很少或不提及；在编的《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两大本中不选入一篇，甚至论文集编载的《有关孙中山研究论著、资料目录索引（1949—1984）》中竟将《宋庆龄选集》中有关孙中山研究的文章目录只列出几篇，连宋庆龄1956年发表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最重要的论文《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的目录或漏掉或被删去。

宋庆龄关于孙中山研究的著作，不仅数量很多（《宋庆龄选集》中仅至60年代就有10来篇），而且质量高，有很多独到见解、新颖观点，史实确凿，文风严谨、精练。因此，从事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后起的同仁们，倘若能够同时研读宋庆龄的有关著作，就会得到极好的启迪，走上研究和探索孙中山的捷径，提高

认识，解决问题。下面，谈谈孙中山思想研究中的两个重大的根本问题。

(一) 关于孙中山晚年的理想是否转变的问题。在近代中国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上，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孙中山自革命初始至终的政治理想，一直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不同，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的旧民主革命中，他的理想和思想理论的中心，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在此后，由于受十月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启迪和帮助，他的理想、理论和政策却发生了飞跃发展。她明确指出：“孙中山的进步的决心使他在晚年能够领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国家最强的动力。”他“看到真理”，“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因为他已经明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了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宋庆龄指出孙中山晚年的理想的改变，是个很新颖的观点。这是她与孙中山并肩从事革命实践而又经过长期从事孙中山研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她知道孙中山的理想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1922年元月初，孙中山在她陪同下刚与马林晤谈后十来天，便在一次演说中大讲“破旧”“生新”的哲学，并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经过两年，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又重新解释他的民权制度“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即非“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最新式者何”？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制度是何种制度？

孙中山晚年虽然还没有用“人民共和国”的文字作出表达，但他的实质精神已显露无疑。更加上宋庆龄除得知他的上述思想状况外，还得知孙中山对于工人阶级在人民共和国的民权制度中是否会占据领导地位的某些谈论和孕育情况（此问题下面专门述说），从而经过探索研究而得出孙中山晚年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新理想的崭新观点。这是完全有理有据的。她并特意以《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命题把它集中表达出来。

然而，遗憾的是，理论界学术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并不以此为然，一直未把这种重要的观点列入研究探讨的课题和日程上来，更不必说予以采纳和宣传了。除去极少数人外，人们至今还一直坚持孙中山的理想始终都是追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说。

（二）孙中山晚年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新认识。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应在革命中争得革命领导权。自大革命失败直到全国解放，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不但更强调这个观点，还一再把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同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联系起来评论。

建国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人们一直认为，孙中山革命40年始终主张中国革命必须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领导和唤起民众。

对此，孙中山著作是否是这样记载的？宋庆龄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很显然，孙中山在旧民主革命近40年，确实是依靠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同盟会和国民党（未改组前）来领导革命的，使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确在于此。但孙中山晚年怎样？对此是否有一定认识和改变？看其晚年言行，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从

其晚年的基本情况来看,他没有解决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正是他未能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科学社会主义者而猝然辞世的悲剧。孙中山晚年的遗愿只是在他逝世后才由宋庆龄继承发扬和实现了的。但也应当肯定,孙中山晚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也确实有些认识和孕育。(1)他不仅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把民权主义从少数者私有改变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且在此后他还一再强调提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团体“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即含有领导的意思)。甚至还明确说“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他晚年一直在积极支持工人运动,乃至说自己要做工人的总统。(2)他把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列宁视为“革命中的圣人”、“最好的模范”、“国友人师”;把列宁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国际无产阶级代表马林、鲍罗廷等都作为共产主义好朋友敬重、信赖。他在广州工人阶级举行的五一节大会上宣扬:俄国工人阶级推倒俄皇,改革政体,建立“独裁”,管理国事,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榜样。(3)至于他与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还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等大批共产党人作为“新血液”吸收加入国民党,乃至让他们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宣传部长等,亲密合作,共同领导国民党改组和北伐大革命等。

孙中山以上思想和活动都是和宋庆龄共同孕育、参与的。孙中山革命理想事业和遗志的忠诚继承者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的革命中始终竭力地为实现其思想和遗愿而奋斗。在大革命中,她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领导,是这样的;30年代初,国内局势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时,她不畏强暴和生命危险,毅然高举宣扬时代需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大旗,英勇地同那些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和遗愿的蒋、汪、封建

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搏斗。她还说：“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粉碎军阀的权力，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自此直至全国解放，她都与中共紧密合作，竭力支持中共领导。新中国建立后，她感到孙中山的理想已开始变成现实，表示由衷高兴，因而更加努力到处宣扬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宋庆龄在从事孙中山研究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则极少提及这个问题；只是在1962年写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才又联系孙中山来阐述“无产阶级领导”和中共领导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意义。如她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起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客人之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但“文革”开始后江青恶毒攻击、辱骂孙中山是“牛鬼蛇神”之时，宋庆龄却又愤填膺，挥笔疾书，并一反过去纪念孙中山诞辰、忌辰不外出活动，只在家中默念的常规，决然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一百诞辰的万人大会，理直气壮地作了长篇演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她强调指出：孙中山——“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的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最后在快结束其演说时，她竟大声疾呼：“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来仍然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孙中山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革命，不仅生前就有了这种思想孕育和遗愿，死后其在天之灵也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

综上所述，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儿子和领袖，而宋庆龄则是他的亲密伴侣、战友和继承人。他们对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历史影响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因此，把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结合起来，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自然历史过程，揭示其历史规律，是很有意义、十分必要的。而从这两位伟人的历史地位及历史的重要性和难度来说，当然应将孙中山研究放在首位，首先应将孙中山研究得深入、科学，评价得公允、正确。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良好的愿望和目的呢？笔者认为，这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把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结合起来，开展百家争鸣。此外，还尤其觉得，在以后的研讨中，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对宋庆龄从事孙中山研究的成果和经验以及评论意见，应更加重视。这对于大家从事孙中山研究，突破一些重大的根本问题、艰难问题，可能有较大的收益。笔者想其原因和理由如下：

首先，宋庆龄是一位偕同孙中山并肩战斗共同生活的历史实践者。实践出真知；实践得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公认，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亲密伴侣和战友。孙中山在革命40年的最后十年，是国际和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新旧时代在转移，国内新旧民主革命在更替；而这十年也正是他遭到旧民主革命重大坎坷和彻底失败、而又是他产生重大转折，转向新民主革命的峥嵘光辉的岁月。正是在这关键性的年代里，他们携手并肩，朝夕相处，共商要事，共同实践战斗。他们这些实践的历史，很多是有记录的，但有的却没有记录，有些（据宋庆龄说）则被陈炯明叛变的炮火烧掉。这种实践历史，宋庆龄在解放前就写了不少有关的文章，特别是解放后在百忙中

撰写的很多研究文章，则给学术界和理论界以更多帮助，不仅提供了一些独到的新颖观点，对公允地评价孙中山很有启迪和裨益，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

其次，宋庆龄是一位成熟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她早在30年代就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笔者已另写论文：宋庆龄30年代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抉择》，见《东岳论丛》1993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处理问题，到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她已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事孙中山研究二三十年了。因此，宋庆龄从事孙中山研究、评论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界理论界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同仁认为，宋庆龄与孙中山是伴侣，感情深厚，研究评论和总结的东西可能带有感情色彩，有溢美掩过之嫌。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早明确指出感情总代替不了理论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宋庆龄不仅熟知此理，也一定会照做的。

其三，宋庆龄学风严谨，实事求是。宋庆龄的文章严谨、周密、精辟，曾受到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老一代大手笔的赞扬，得到了很多人的称颂和学习。“实事求是”的原则，这首先是孙中山先生教给她的。1922年9月2日孙中山为上海“求是”中学题的词就是“实事求是”，她是首先领教遵循的。对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宋庆龄不仅敬重，也是严加执行的。

还有些原因和理由。但从以上几点即可明白看出，宋庆龄发表的孙中山研究的众多文章和成果，是为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理论界和学术界在从事孙中山研究、宣传时，将宋庆龄关于孙中山研究的著作也作为阅读、研究、学习的历史文献，把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研究队伍中的一家，将孙中山研究和宋庆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她的精

辟的观点和资料，来科学地从事孙中山研究及宋庆龄研究，科学而公允地评价孙中山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这应当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二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特别是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就在这极端黑暗的社会深渊中迅速沉沦下去，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悲惨局面，完全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王朝的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面对着这样悲惨的局面，中国人民特别是一些爱国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义愤填膺。一方面，那些爱国有识之士与广大中国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跟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了英勇不屈、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了千辛万苦，走向世界，到处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求挽救近代中国的危局。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和政治家孙中山同他的伴侣、战友、忠实继承人和伟大的女政治家宋庆龄，就是其中两位最杰出的代表。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诞生在19世纪后半期（1866、1893），成长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他们既生活在灾难深重的黑暗的旧中国，又处身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中。这种客观时势对他们的影响极大。如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尤其是其后，由“改良”走上革命道路，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等等，就是因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刺激而又见到中国封建势力极端腐败无能和反动所致。又如二次起义后，他走向世界，寻找革命真理，对其主义的产生和形成，甚至对其

终生政治生涯都影响很大。

19 世纪中期，世界上有两种思潮并立盘旋震荡着。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前者原本是在上两个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崛起的革命时期，以“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博爱”作思想武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曾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到了 19 世纪末叶，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勃兴，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它的一些虚伪性和反动性便日益暴露出来。而后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自 19 世纪 40 年代诞生，即以新的英姿和锐不可挡之势，迅猛磅礴于世界。由于它的威名和方兴未艾，所以各个阶级都有人以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主义”自许，并掺合到这一思潮之中，这就使它更加“宏伟、壮观”、庞杂迷离。

为了救国救民，自 19 世纪末叶起，孙中山几次周游欧美时，就曾接触到并模糊地认识到世界上这两大思潮。他有爱国爱民的强烈愿望，但又以其自发而浑然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看待世界及问题，对于这两大思潮分辨不清，一概视之为进步思想和能挽救中华的真理予以热情欢迎，兼收并蓄，全都搬到中国来，作为他的理想和革命的思想武器。他以此为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近代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组织发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曾说，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他革命的全过程来看，孙中山的确是近代中国最早（大约在 1896 年以后几次游历欧美时）接触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并对之抱有很大热情的人；他自诩为“社会主义者”，又创造出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学说。

在本世纪 20 年代以前，面对着国际上诸多庞杂的社会主义思想派别，尽管孙中山说明他最推崇的是“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

(亨氏即美国人亨利·乔治；麦氏即马克思，孙中山这里译为“麦克司”)，但实际上他当时最推崇的是亨氏社会主义，并创立了他的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他还认为这可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使国富民强，救国救民。

而孙中山对于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论其著作抑或是革命实践活动都表明，他从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有好感，深为敬佩；但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此他并不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或曲解。所以，这只局限于口头上作某些介绍和宣传，仅是感性的东西。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还未传入中国的时期，能有这种感情并介绍、宣传，那是很值得肯定的。他这时受到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否仅仅如此？这应当是进一步探索的课题。然而，这个时期，他在国际上受影响最深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接受并要试行的则是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那是无庸置疑的。

但到了本世纪20年代以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实践，显然得到了契机，产生了较明显变化。这是因为他和宋庆龄得知列宁实践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同时，他们又看到了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而使近代中国革命得到了生机；特别是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失败和陈炯明叛变，使他们遭到致命打击，陷入绝境之后，孙中山和宋庆龄终于从失败、挫折中，从新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马列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得到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从而在他们的思想中爆发出某些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萌芽和火花。正如宋庆龄后来回忆和研究孙中山时所说的：20年代以后，孙中山“终于将革命真理找到了”，“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宋庆龄所说的“革命真理”和“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指的是马列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

20 世纪初期，青少年时代的宋庆龄也走向世界，她赴美留学后，同样接触到世界两大思潮，并受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获得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从而逐步地树立起革命的世界观和理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随后到日本投身于他的身傍，结为伴侣，共同战斗。在新时代曙光的照耀下，她不仅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学生和忠贞伴侣，而且因为她的思想纯洁、敏锐、激进，更易于接受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因而使她与孙中山在新世纪的革命征途中产生了双向影响。在 20 年代的新时期，孙中山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和宋庆龄等殚精竭虑的襄助下，与刚诞生的振兴中华的救星共产党紧密合作，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生面。

时势造英雄，新时代创造出孙中山和宋庆龄等与时俱进、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巨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开创时期，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为中国革命、为新时代和世界东方创造出异常辉煌的业绩。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前后，他们欢欣鼓舞地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密切合作，创造出与旧民主主义明显不同的众多新奇迹。最令人瞩目的有：

（一）制定出崭新的三大革命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核心是与共产党合作，吸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作为“新血液”，改组国民党。

（二）“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的观念”科学社会主义：把他们的民生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好朋友”，再度申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即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三）“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提出了他们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政治理想是孙中山新旧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它既是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又是其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灵魂，二者是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

自然，他们当时是含蓄地“抛弃了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追求”，委婉地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理想”。虽然他们当时并未从字面上直接写出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字样，也并未指明是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但这却令不少国民党人瞠目结舌，或明或暗千方百计地出来反对。而后来的思想理论界或学术界也有些人不承认或看不出孙中山和宋庆龄当时在政治理想和信仰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仍认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依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这一变化是他们在20年代新世纪进步的重要标志，全国解放后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些欠公允。因此，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宋庆龄在撰发的纪念文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中，强调指明了这个重大问题。她说：“孙中山的进步的决心使他在晚年……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因为他已经明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了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

（四）对待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同情、宽容、支持，对于由它们来参加民主革命的领导或来领导民主革命的科学理论，开始有所认识和孕育。他们当时采取的不少措施和举动，也似乎表明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人共同领导民主革命。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多次会晤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又如他们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多次会晤、与苏俄代表越飞的会谈、请鲍罗廷等共产党人作顾问；再如不仅吸收大量的中国共产党人作“新血液”加入国民党，还尤其是把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吸收到国民党中央，参加国民党改组和对大革命的领导等等。特别是在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偕同宋庆龄参加工人阶级五一节活动的演讲和答记者问时，曾一再地讲到：在中国革命中工

人团体具有“指导”、“先锋”作用，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这场运动中，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个至关重要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都经过了一个艰难而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在1925年1月“四大”时才初步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前1923年秋至1924年只有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少数人有初步认识）。孙中山虽然是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原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他和宋庆龄这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能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上述那种变化和反映，的确是个极不容易的重大问题。

（五）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耕者有其田”和解决国富民强的“发达资本”的两大口号和原则，也是他们在新时代创造的新奇迹。孙中山在创立其三民主义时曾说过一句名言：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孙中山曾无数次说明，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了创造，他将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拿到中国来时改称为民生主义。因此，孙中山的上述名言，也就是说：20世纪不得不为社会主义的擅场时代也。所谓“擅场”意为超越一般、压倒全场也。孙中山的确是极聪明、极敏锐的政治家。虽然他说此话时并没有基本上看懂科学社会主义，得知其真理和它对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但他却从世界大潮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并有幸而言中了。如果说本世纪初他就预计到20世纪的时代实质，那末到20年代社会主义大潮更加汹涌澎湃来临时，就更使他坚信自己的预言是何等正确而又伟大。历史事实表明，他和宋庆龄对此都是很坚信的；这正是他们在20年代初能够大踏步前进的重要原因。但十分遗憾，孙中山在这光辉的“擅场时代”刚迈出第一步后，竟被积劳成疾的病魔夺走了他的宝